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古希腊铭文辑要

张强 译注

 中华书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古希腊铭文辑要

张强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铭文辑要/张强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8.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101-13093-5

I.古… II.张… III.金文-研究-古希腊 IV.K885.45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3500 号

-
- 书 名 古希腊铭文辑要
译 注 者 张 强
丛 书 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 吴爱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3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93-5
定 价 128.00 元
-



作者简介

张 强 1960年生，河北滦县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AC)主编，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西方古典文献的整理与教学工作，发表《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西方古典文献早期写本的行款》《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等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叙 例

甲、本书所举铭文从古代希腊历史之分期,排序从原刻的刻勒年代;复刻者视铭文内容而定,如“德拉古法”。

乙、希腊铭文本无标题,后人追题,或因发现地而名,如“帕罗斯碑”(Marmor Parium);或据铭文的内容而定,如“雅典帝国币制法令”(Athenian Decree enforcing the use of Athenian Coins, Weights, and Measures)。本书所据底本之篇名,汉译有所改动;无追题者,为自拟,如“迪普隆陶罐”(西文目录篇名带星号者)。中文目录篇名带星号者为已刊译注,本书复录多有补正。

丙、题解项除铭文的发现地、藏地、所据底本外,主要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兼及全篇的简析。

丁、西文校勘符号从莱顿体例(Leidener Klammersystem,详见附录1),本书据中文惯例略有改动,具体标识如次:

□根据原刻所能确定之缺失字母个数者,一字母一“□”。十个字母以上附注说明。

◻ 缺失字母个数不确者。

⊠ 可辨识之字母个数者,一字母一“⊠”。十个字母以上附注说明。

上述符号另视原刻现状分别组合使用,如“□◻”“□⊠”“⊠⊠”或“□⊠⊠”等。凡两行以上者从略,附注说明。

[] 内容为校勘拟补者。因中文文字异于字母文字,汉译无法逐一对应标出,校勘审定者亦同。

〈〉 内容为审定者。

戊、缺文拟补,差异间见层出。本书仅据所选底本逐译,出入较大者附注说明。

己、西方古典文献均援据《洛布古典丛书》；铭文辑录、辞书等按西文缩略之惯例，取大题实词的首字母或仅标注著作者名的首字母（见附录 2）。

庚、为方便计，本书所附希腊文为拉丁化形式（附录 4 除外）。字母“η”转作“ē”，“κ”作“c”，“ω”作“ō”。以“-os”结尾的希腊人名，西方语文惯与“-us”结尾的拉丁人名混用。本书从希腊文音译，如“Demetrios”，作“德莫特里奥斯”，“Leostratos”作“莱奥斯特拉托斯”。除“约定俗成”者外，非常用地名、神名等专名亦据此法逐译。

导 言

古希腊语中,铭文作“epigraphē”,系由介词“epi”(在…之上)与名词“graphē”(书文)复合而成,指的是陶、金属、石灰石或大理石等硬质载体上的刻文以及书写在陶器上的字母文字^①。

作为希腊字母文字起源的重要史料,已知最早的希腊铭文为古风时代的器物铭,时在公元前8世纪中晚期。因铭文定年的差异,有关字母文字起源的讨论复见“公元前八世纪早期说”^②与“公元前八世纪中期说”^③。更早的年代则以假设为前提,认为草纸、兽皮或木片作为文字的载体似应始于公元前850年前后^④。如果说草纸与腓尼基字母同时传入希腊的话,书写材料初为草纸的推论却也不无道理^⑤。但是,鉴于草纸的易腐特性,已发现的实物中,最早的遗存也只是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残篇^⑥。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同“公元前八世纪中期说”,亦即古风时代^⑦的起始年代。

① 希腊语的起源可追溯到迈锡尼时代的线文乙,但就语言的连续性及其传播的范围而论,刻勒在泥板上的线文乙并不属于铭文学的研究范畴。参见 A.G.Woodhead, *The Study of Greek Inscrip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

② *OCD*³, 2003, p.66.

③ *LSAG*, pp.11-21.

④ J.B.Bury and Russell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5, pp.520-521, n.107.

⑤ 相关讨论,详见拙文《西方古典文献早期写本的行款》,《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15页。

⑥ Martin L.West, “The Oldest Greek Papyrus and Writing Tablets: Fifth-Century Documents from the ‘Tomb of the Musician’ in Attica”, *ZPE* 180 (2012), pp.1-16.

⑦ 已知最早铭文的定年不同,亦影响到古风时代的定年,也有着“公元前八世纪早期说”与“公元前八世纪中期说”。

不唯字母文字的滥觞肇迹,希腊文明的演进历程均可见诸铭文资料;从刊布的法律、法令、账目到墓志铭、题献、随意刻勒等,与时人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以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一不承载着历史的瞬间。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铭文学家 L. 罗贝尔(1938 年—1984 年)所言,“……或可把希腊、罗马的历史视为一种‘铭文文明’”^①。

发端于希腊古风时代的这种“铭文文明”,形同中国的青铜器文明,早期也经历过所谓的“简铭期”。其时的铭辞简短,传世者少,初为器物铭,残泐且漫漶多见。作为断代的重要依据,铭文字母的书体因地、因时而各有不同,差异间见;铭文的行款则先右书(显然亦受腓尼基的影响)而牛耕刻写法,经左书而定式作行列布局。在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中,述及写本行款的沿革势必借助早期铭文方可推断其可能的形态^②,而作为“第一手资料”与传世抄本相比,在校勘实践中铭文的“他校”意义往往更大。“萌生”(此即英语中所谓的“archaic”)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法令以及盟约等铭辞亦见证了希腊城邦的发展以及邦际间的互动。随着雅典的崛起,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显赫,民主昌盛,以石刻为主的铭文也进入“长铭期”,数量上亦以雅典为最。其中,雅典相继出台的诸多帝国法令补苴了文献记载的阙如。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加速了东西方的交往,小亚、黑海等地的遗存极大丰富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记录,现存铭文的多样性反映出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及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据统计,现存希腊铭文的数量约在十万上下^③,大致可分为“官刻”(public inscriptions)与“私刻”(private inscriptions)两大类:“官刻”指的是法律、法令、建筑账目、拍卖公告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记录;与此相对的“私刻”包括墓志铭、契约、祈愿或还愿题献等关乎个人行为的铭辞^④。比较而言,流传下来的铭文多为私刻。以雅典为例,铭文遗存约计两万,其中墓志铭过半,各种题献亦

① Louis Robert, “Les épigraphies et l'épigraphie grecque et romaine”, in *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1961, p.454.

② 参见《西方古典文献早期写本的行款》,第 14-18 页。

③ Adele Scafuro, “Keeping Record, Making Public: The Epigraphy of Government”, in Hans Beck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 John Wiley & Sons, 2013, p.401.

④ A.G. Woodhead, *The Study of Greek Inscriptions*, pp.35-36.

逾数千^①。

在西方古典学界,官刻被视为档案的一种保存形式,一种公共记录,但对城邦、德莫抑或部落所刊布的这种公共记录是否自底本出、底本是否归档、档归何处、始藏于何时等诸多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则因相关史料的匮乏、零乱而新论迭出。大体上讲,公共记录的出现、藏地与数量盖与城邦文明的发生、发展相始终,如前所述,其载体在刊布前应为草纸或书板,决议成文后保存在公民大会所在地、议事厅或神庙殿(Metron)。例如,公元前409/408年复刻德拉古法的明文规定(铭文14),该法中“有关凶杀的法律将由法律司书——继从王者执政官处得该法后——会同议事会司书勒石刊布,并置于王者执政官官署前”。“继从王者执政官处得该法后”句表明,德拉古法应抄写在草纸或书板上,保存在“王者执政官处”。提洛岛的规定更加明确,“市场管理者继把判决刻写在书板上或完成其余记录后,须交与议事会存档(dēmosion)”^②。该部法律颁布于公元前235年至前200年之间,在议事会存档当时似已成定制,流传下来的官刻也似应源自业已通过的文本^③,但也并非照搬全刻,有时也只是摘录其中的部分内容^④。尚需指出的一点是,有关古希腊官方记录的相关讨论多以雅典史料为据,所得结论也各有见地。在后来的罗马,法律与元老院的决议(senatus consulta)度置于国库(aerarium)、备案后方能生效却是不争的事实^⑤。

在古代希腊,以石刻为主的官刻多见于神庙、圣地、大型建筑、广场以及剧场等所谓的“公共空间”,其作用形同现今之公告;另外,作为垂诸久远的公共记录,勒石刊布的法律、法令、建筑支出等政务信息亦间接地反映出城邦公开、

① Adele Scafuro, “Keeping Record, Making Public: The Epigraphy of Government”, p.401.

② IG XI, 3, 509, p.8.

③ 有关公共记录的相关讨论参见 A.L.Boegehol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Archive at Athen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76, No.1 (Jan., 1972), pp.23–30; “Andokides and the Decree of Patrokleides”,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Bd.39, H.2 (1990), pp.149–162; James P.Sickinger, *Public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Classical Athe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John K.Davies, “Greek Archives: From Records to Monument” in M.Brosius (ed.), *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 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2003, pp.323–343.

④ Louis Robert, “Les épigraphies et l’ épigraphie grecque et romaine”, p.459.

⑤ F.Millar, “The Aerarium and Its Officials under the Empir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54, Parts 1 and 2 (1964), pp.33–35.

透明的运行机制,如本书所举的《雅典殖民萨拉米令》(铭文 29)以及《埃莱赫塞奥斯神庙建造账目》(铭文 57)等。历史上,最早措置铭文价值的盖为西方“历史鼻祖”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九卷本《历史》中,希罗多德直接征引或转述的铭文凡二十处^①,范围包括希腊本土以及吕底亚、巴比伦尼亚、波斯、埃及,其中三则可与已发现的铭文相互印证,例如本书中的《科林斯阵亡将士墓志铭》(铭文 35)、《普拉提亚大捷谢恩柱》(铭文 36)。至于希罗多德征引的铭文是其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当作别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希罗多德起官刻与私刻均已作为历史记录而为时人所关注。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的史著中也常常征引或述即铭文资料^②,公元 2 世纪的旅行家保桑尼阿斯在游历希腊期间,对所见铭文与遗迹描述得更加详尽^③。但他对铭文所记并非盲目采信,也时有辨析与正误^④。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遍布希腊世界的官刻与私刻经水火兵燹多已残泐或被移作他用,更多的则消失殆尽或仅见于文献记载。在近代欧洲,对古典铭文的广泛辑录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在众多古物收藏家、旅行家、商人、外交家中,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奇里亚科(Ciriaco de Pizzicolti, 1391 年—1452 年)是早期铭文收集者之一。在经商过程中,他先后游历意大利南部、希腊、埃及以及近东地区,所录希腊、拉丁铭文数以千计;辑有六卷本《碑铭经眼录》(*Commentarii*),后因火灾失传。从现存部分笔记和抄本可以得见,奇里亚科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如实临摹原刻字母的正书与反书及其行数^⑤。继奇里亚科之后,收藏家在很长一段时期依旧不加区分地把希腊语与拉丁语碑刻一同在博物馆展陈或结集出版,历史学家也很少把铭文视为可信的史料加以利用^⑥。

① 详见希罗多德《历史》: I, 51.3-4, 93.3, 187; II, 102, 106, 125.6, 136.4, 141.6; III, 88.3; IV, 14.3, 87.1, 88.1, 88.2, 91; V, 59-61, 77; VII, 30.2, 228; VIII, 22, 82.1。

② 详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I, 132.1-3, 134.4; II, 43.3; III, 57.2; IV, 118.1-4, 119.2; V, 18-19, 23.1-5, 24.1, 47; VI, 54.6-7, 55.1, 6.55。

③ 详见保桑尼阿斯《希腊游记》: I, 13.8, 34.4, 35.8, 41.2; II, 9.7, 23.6; IV, 33.6; V, 6.6, 10.7, 15.10; VII, 6.5; IX, 3.3; X, 28.7。

④ Helène Whittaker, “Pausanias and his Use of Inscriptions”, *Symbolae Osloenses*, Vol. LXVI (1991), pp. 177-179.

⑤ S. Chabert, “Histoire Sommaire des Etudes d' Epigraphie grecque en Europe”, *Revue Archéologique*, Quatrième Série, T.5 (Janvier-Juin 1950), p. 296.

⑥ Peter Liddel and Polly Low, eds., *Inscriptions and Their Uses in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9.

直至意大利诗人、史家 S.马费伊(1675 年—1755 年)在其所著的《石刻文分类要义》(*Ars Critica Lapidaria*)一书中才对希腊铭文与拉丁铭文做出了区分,并引起意大利学界对研读古希腊语的关注;在用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撰写的出版希腊、拉丁铭文汇编计划书中,马费伊进一步阐述了铭文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①。至 19 世纪,德国古典学家 A.伯克(1785 年—1867 年)的理论与实践最终使铭文研究成为专门之学,铭文作为基础资料在历史研究中也得以采信。

伯克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专注神学,后受 F.A.沃尔夫(1759 年—1824 年)的学术影响转做古代希腊研究。伯克于 1817 年出版的四卷本《雅典国家财政》一书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和已知铭文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叙述方法“第一次使近代的人们了解一个古代国家的日常生活”^②。也正是在撰著《雅典国家财政》的过程中,伯克更加意识到传世铭文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1822 年,他上书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建议出版一套希腊铭文汇编,并得到立项支持。在建议中,伯克除了强调铭文研究的重要性外,还制定了相应的整理规则^③。1825 年,《希腊铭文集》(*CIG*)第一分册出版;最终成书的四卷本中,前两卷由伯克编撰,第三卷由 J.弗朗兹(1791 年—1865 年)编撰,至 1859 年 E.库尔提乌斯(1814 年—1896 年)与 A.基希霍夫(1826 年—1908 年)完成了第四卷的编撰工作,H.勒尔(1839 年—1899 年)负责整理的全书索引于 1877 年出版。尽管《希腊铭文集》出版伊始即引发了德国学界的门派之争,但其学术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伯克所确立的按区域分类、仅著录希腊铭文的编撰体例及研究方法则标志着铭文学的诞生。

从 1860 年起,基希霍夫接续《希腊铭文集》的整理;在维拉莫威兹(1848

① A.M.Pastorino, “Maffei, Francesco Scipione”, in *Brill's New Pauly, Supplement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eds. by P. Kuhlmann and H. Schneider, Leiden-Boston: Brill, 2014, pp. 386-388; S. Chabert, “Histoire Sommaire des Etudes d'Epigraphie grecque en Europe”, *Revue Archéologique*, Quatrième Série, T.5 (Janvier-Juin 1950), p. 296.

②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116 页。

③ A. Boeckh, *Notitia Corpori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sumptibus Academiae Borussicae edendi* (15. Juli 1822), in A. Harnack,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Zweiter Band: Urkunden und Ak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0, 419-420 (Nr. 200).

年—1931年)负责期间(1902年—1931年),《希腊铭文集》更名作《希腊铭文》(IG),并使其成为古典学研究最重要的史料集之一。作为柏林-布兰登堡人文与自然科学学院(即原来的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1992年更名)的科研项目,《希腊铭文》迄今已出版63册(其中一些已出第三版),涵盖了巴尔干半岛及周边地区已发现的铭文遗存。

与拉丁铭文相比,希腊铭文的辑录相对分散。除《希腊铭文集》外,最新发现的铭文多见于《希腊铭文补编》(SEG)以及《希腊研究杂志》(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所设的“铭文简报”专栏。选注本中,学界惯常引据的有W.迪滕贝格(1840年—1906年)编撰的《希腊铭文集成》(SIG)。该集成三卷,收录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65年希腊、小亚铭文凡1268篇,注释为拉丁语。E.L.希克斯与G.F.希尔的《希腊历史铭文导读》^①盖为第一部以“历史铭文”为大题的希腊铭文辑录。M.N.托德的两卷本《希腊历史铭文选》(GHI),断限起自公元前6世纪而终于公元前323年。R.梅格斯与D.刘易斯合编的《希腊历史铭文选:至公元前五世纪》(M-L)与托德本的编撰体例相类,在爬梳前人校勘的同时亦多见疏证。选注本中另有专题汇编,如P.A.汉森的两卷本《希腊碑铭体短诗》(CEG)以及E.施威策《希腊方言铭辞举要》。译注本中,P.J.罗兹与R.奥斯本的希英对照本《希腊历史铭文:公元前404年—前323年》^②是为释读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铭文遗存的重要参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资利用的数据库亦在不断建设与完善中。其中,作为标准本,已出版的《希腊铭文》与《希腊铭文补编》均有电子文本可供检索。另外,S.兰伯特在其《公元前352/351—前322/321年雅典法律及法令》^③一书的基础上,创办“阿提卡铭文在线”(AIO)。该项目旨在整理现存的两万余篇雅典及其周边地区的铭文,现已完成281篇雅典法律及法令的译注工作。

从近代嗜古者狂热的搜罗到伯克的铭文系统整理,至法国铭文学家、古典学家L.罗贝尔(1904年—1984年)一代,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综合

① E.L.Hicks and G.F.Hill, *A manual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2.

② P.J.Rhodes and R.Osborne, eds.,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S.Lambert, *Inscribed Athenian Law and Decrees 352/1–322/1 BC*, Leiden–Boston: Brill, 2012.

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亦风气渐成。在学科分类上,与文献学、考古学、草纸学、钱币学、古文字学、史学等一样,铭文学也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据 F.贝拉尔等主编著的《古代与中世纪铭文学研究书目举要》,已出版的希腊、拉丁铭文辑录,希腊、拉丁铭文专题研究,希腊、拉丁铭文学研究汇编以及希腊、拉丁铭文学者论文集等相关信息从 1986 年第一版的 1872 项增至 2010 年第四版的 2975 项。该书除铭文辑录外,所列通论、刻文考证与释析、著录等为初学者登堂入室提供了必备的参考书目。其中,罗贝尔的《铭文、希腊与拉丁铭文》对铭文在古史研究中的意义阐述得最为充分。A.G.伍德黑德的《希腊铭文研究》对希腊字母的起源、铭文的行款、分类、定年等多有述及。本书引用较多的是 L.H.杰弗里的《希腊古风时代诸地书体》(*LSAG*)与 M.瓜尔杜奇的《希腊铭文:从起源到晚期古代》,这两部专著对希腊字母在不同地区的刻写法及发展变化论述得极为详尽,重要的铭文还附有原刻的图片、摹本或隶定文本。瓜尔杜奇所举铭文除了时间跨度长以外,每篇铭文另附意大利语题解及译文。比较而言,瓜尔杜奇的《希腊铭文:从起源到晚期古代》更适于作希腊铭文学的入门教材。S.夏贝尔所著的《希腊铭文简史》虽未被《古代与中世纪铭文学研究书目举要》收录,但其对 20 世纪前的希腊铭文辑录与系统整理的爬梳颇有独见,值得参考。

在国内,随着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界也开始关注铭文的译注以及铭文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相关资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作为社科项目结项成果,本书在前人铭文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所举铭文凡一百一十五篇,每篇设题解、译文、注释三个部分,断代从希腊历史年代的分期,其中古风时代铭文二十九篇、古典时代铭文五十八篇以及希腊化时代铭文二十八篇,除关照不同历史时期的铭文外,还措意不同载体、不同种类的铭文,目的是尽量反映铭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功用。尚需指出的一点是,在已发现的希腊铭文中阿提卡铭文约占五分之一,涉及的内容也最为丰富,本书所谓的“辑要”也难免以这一地区的铭文遗存为重。

应该承认,浩繁、复杂的西方古典铭文整理,非一代学人之功可以穷尽。就古典语言本身而言,早期出版的铭文集注疏均为拉丁语,现代研究成果除英语外,大多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在小亚及黑海等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又以俄语居多。本课题结项即已迁延,成稿后又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多有

补正,即使是已发表的前期译注成果,其实也一直在不断修改与完善。平心而论,本书所举铭文的翻译与注释只能说是一种尝试,错讹一定难免,尚祈学界同道继续批评指正。

目 录

叙 例	(1)
-----------	-----

导 言	(1)
-----------	-----

一 古风时代

1. 奈斯托尔陶樽*	(3)
2. 迪普隆陶罐	(5)
3. 科拉克斯陶樽	(7)
4. 阿波罗造像题献	(9)
5. 女青年石像	(11)
6. 塔塔伊埃陶瓶	(13)
7. 尼克塞尔莫斯陶樽	(15)
8. 德莱洛斯法*	(17)
9. 萨索斯祭坛铭辞	(19)
10. 希腊雇佣兵题献	(20)
11. 哈尔克达马斯青铜罐	(22)
12. 特提霍斯基志铭	(24)
13. 科尔库拉“proxenos”墓志铭*	(26)
14. 德拉古法*	(29)
15. 雅典执政官表	(32)
16. 希腊雇佣兵远征题记*	(36)
17. 基奥斯法	(40)

18. 阿里斯提斯获胜题献	(43)
19. 叙巴里斯人与塞尔达伊奥伊人的盟约*	(45)
20. 埃雷特里亚法	(47)
21. 科罗伊索斯在阿尔特弥斯神庙的祭献	(49)
22. 阿法娅神庙奠基文	(51)
23. 科罗伊索斯墓志铭	(53)
24. 赫尔墨斯方柱碑	(54)
25. 庇西斯特拉托斯祭献*	(56)
26. 大流士致伽达塔斯书*	(58)
27. 科尔库拉契约	(60)
28. 埃利斯与赫拉埃亚的盟约*	(62)
29. 雅典殖民萨拉米令*	(64)

二 古典时代

30. 卡利马霍斯祭献柱碑	(69)
31. 马拉松大捷谢恩祭献*	(71)
32. 雅典陶片放逐制*	(72)
33. 斯巴达人题献	(75)
34. 地米斯托克利法令*	(77)
35. 科林斯阵亡将士墓志铭*	(80)
36. 普拉提亚大捷谢恩柱*	(82)
37. 迈加拉阵亡将士墓志铭	(85)
38. 戈隆谢恩祭献	(88)
39. 米利都反僭主令*	(90)
40. 雅典关于埃吕斯拉伊的法令*	(91)
41. 戈尔图斯法典	(93)
42. 雅典帝国币制法令*	(95)
43. 科雷伊尼阿斯法令*	(98)
44. 雅典与哈尔基斯的关系	(100)
45. 雅典阵亡将士名录	(102)